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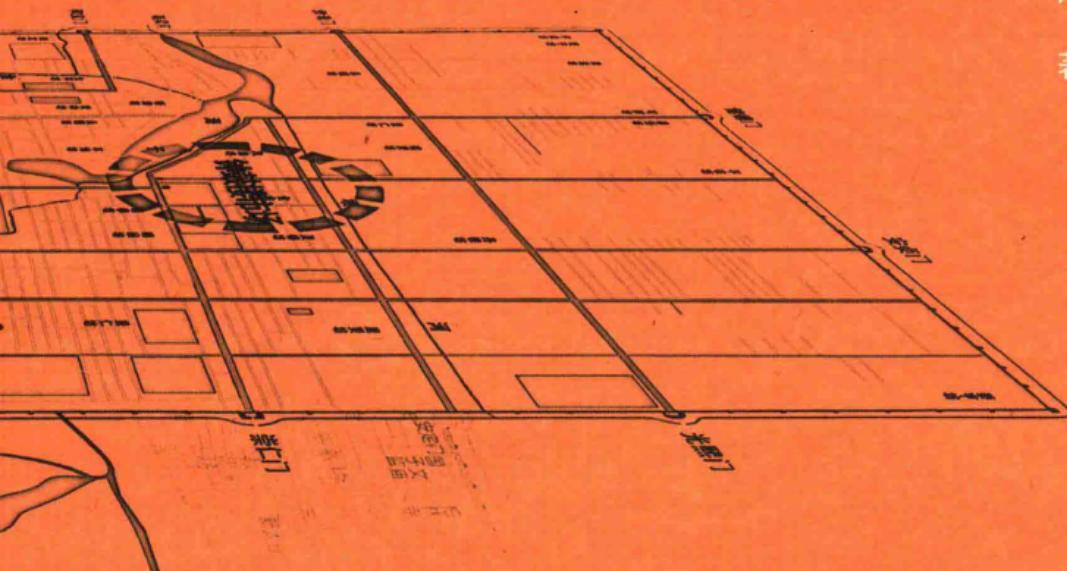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实验研究

辽金元时期北京城市研究

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实验研究系列 董卫 主编

A STUDY ON PEKING CITY
IN LIAO, JIN AND YUAN DYNASTIES

诸葛净 著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实验研究
董 卫 主编

辽金元时期北京城市研究

A STUDY ON PEKING CITY
IN LIAO, JIN AND YUAN DYNASTIES

诸葛净 著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辽金元时期北京的城市空间秩序及其变迁展开研究。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将辽金元时期的北京城置于宏观的政治与经济变迁脉络中考察城市角色从地区中心向都城的转换，及其对城市物质空间发展带来的影响。下篇则将宫殿、坛庙、市场、道路等既作为社会力量的载体，也作为主要的城市形态构成要素，从权力运作、经济体系等方面展开讨论，揭示国家制度建构、日常生活状态与城市形态变迁间的关系。

本书可供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建筑历史与理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及文化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金元时期北京城市研究 / 范海生著.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641-4741-9

I. ①辽… II. ①范… III. ①城市规划—研究—北京市—辽金元时代 IV. ①TU984.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7815 号

书 名：辽金元时期北京城市研究

策划编辑：戴丽 姜来

文字编辑：张万莹

美术编辑：毕真

责任编辑：姜来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 编：210096

出 版 人：江建中

网 址：<http://www.seupress.com>

电子邮箱：press@seupress.com

印 刷：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889mm×1194mm 1/16

印 张：12

字 数：322 千

版 次：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4741-9

定 价：39.00 元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发行热线：025-83791830

丛书前言

文化遗产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积累性产品。显而易见，每个人从诞生之日起所接触到的事物都是前人创造的，而每个人的一生都多多少少为后人留下了些许物品，而所有这些物品的社会性积累就构成了我们的文化遗产。这其中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对前人所有创造发明的淘汰性结果，只有那些经过复杂的历史选择过程并留存至今的一部分前人的遗存，才有可能进入文化遗产的行列；二、文化遗产就存在于我们身边。文化遗产的存在强化了社会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使每一座城市和乡村都有可能形成与众不同的特性。唐朝诗人刘禹锡“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诗句正可用来表达文化遗产的宝贵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本身就是人类不断学习、思考和选择的过程。保护文化遗产不仅是为了保留人类过去的印记，更是为了学习和传承古代智慧，巩固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为未来留下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在所有的文化遗产中，城市与建筑遗产是其中最为显著、庞大而又十分复杂和综合的一部分。这类文化遗产包括了各种历史景观、古老城镇与乡村、传统建筑、地下文物以及在历代城市与建筑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技艺、方法与传统。对城市与建筑遗产的研究与保护需要跨学科、多部门的合作，需要长时间刻苦的探究与思考，才能找到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符合科学规律、适应历史环境的保护方法。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素有重视城市与建筑历史和保护研究与实践的传统，自刘敦桢教授创系于1927年第四中山大学始，就与杨廷宝、童寯诸先生确立此研究方向，经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学者不懈努力，发扬光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便为国家培养了四届建筑遗产保护的专业人才，目前在全国相关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21世纪，建筑学院招收建筑学遗产保护本科生，在建筑遗产和城市遗产保护两方面齐头并进，取得了突出成果，承担了近百项重要的城市和建筑遗产保护工程项目，出版了相关论著数十部，为我国的遗产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

2008年“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立，2009年进入建设期，实验室以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和建筑设计与理论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为主干，整合包括土木、环境、材料、化工等各相关学科，在全国许多知名学术机构和专家的支持下开展了跨学科的遗产保护研究与实践，目前已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成为我国城市和建筑遗产保护领域最大、最重要的教育、科研、实践和对外交流的基地之一。

现在，其中一部分研究内容纳入了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实验研究”系列丛书，与实验室的研究方向相应分为“城市与建筑遗产的理论研究”“建筑遗产及其退化机理的实验研究”“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的绿色途径”“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的数字化方法研究”共四卷十余册，将陆续与读者见面，希望得到专家学者和所有读者的指正。

我们相信，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的未来既依赖于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也在于相关技术方法和理论水平的发展与创新，更得益于家国意识、环境观念和社会组织的强化与融合。唯有此，才能形成适应我国新型城镇化条件下建立遗产保护体系的需要，以满足21世纪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

是为序。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东南大学)主任

序

十年磨一剑。诸葛净君的《辽金元时期北京城市研究》一书即将问世，我有幸提前阅读，十分欣喜。这本书是她在十年前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作完成的，但其研究厚度、深度和力度，已大大超越当时的论文，体现出她这些年来持之以恒对研究对象不懈探讨的努力和认识新知的求索。

北京，大家熟知的中国首都，自明清难之役后永乐将京师由南京迁到北平后始有此称。此后约500年，北京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帝都。民国时期，一度北京复为北平，直到1949年首都确立，北京之称又沿用。该书借用“北京”一称，说的却是封建帝都之前的事情，其时间范畴为辽金元，与后来的北京呈梯度关系。如果说历史城市是个压缩饼干，那么将北京之前的压缩拉开，绝非易事。除却如烟的时间带来城市变化错综复杂或者消解外，对于北京帝都而言，实经历辽金元若干少数民族统治或建置管理时期后的发展产物，其政治体系、思想体系、经济体系、文化体系，有其时少数民族的显著特征，区别于汉族久远的传统社会体系，但作为一个朝代，辽和北宋的并峙、金和南宋的对立、元的铁蹄未真正跨越江南却横扫欧亚，又使得辽金元京城和汉民族的政治社会制度、前朝的都城形制、甚至和国外的文化习俗密不可分。做这样的研究，非有见识的厚度不可。可喜的是这本书，充分展现了作者对于研究对象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将这样的纷呈网络有序又跨越地解读出来。这部分的内容主要在“上篇——区域角度的解读”中表现充分。

从研究的角度而言，历史都城北京从来就是诸多学问家致力研究的对象，甚至毕生一以贯之，其相应成果在该书的绪论中均有评述。如果说该书与大家们的治学有何区别，我以为在研究的深度上吸取各家成果而有突破的是将北京立体起来。其关键是兼长了制度研究和城市的空间体系研究。该书分为两部分，上篇的立体在于：从辽的五京体系，金的京、都体系，元的两都体系，来认识北京的前世，从而打破了定位于地理上的北京进行纵向研究的角度，是触及到真实的城市发展机制、缘由和动力的原本研究，其中尤其重视的少数民族的经济支撑、生活方式对于京城形成的影响，很有见地。下篇的立体在于：解剖了城市的若干性质的空间——礼制的、商业和交通的、寺院宫观的、居住和街巷的，除了礼制的内容外，后面三部分主要以叠加到元代时期的大都的生活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十分丰富，论证坚实。下篇的第一部分，作者用的是“礼仪”这个词而不是“礼制”，也是下篇讨论的重点——从礼仪的角度观察和分析礼制建筑的选址、布局、功用及相互关系。作为介绍，我更愿意用“礼制”以和其他性质的建筑及空间相并列理解。却也是在这点上，可以看出作者如何将城市建筑和空间立体化的认识角度。

该书的写作，主要基于文献阅读及其广泛的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融会贯通的认识和运用，并进行创新，力度很大。城市史是大概念建筑史中最难把握的研究对象，对其解读，要牵涉历史、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等相关学科，阅读的海量和综合思辨的要求很高，相信读者可以从相关注释和参考文献中看出作者的用力和能力。另外，由于作者发挥建筑学的特长，将诸多纷繁问题化解为图示分析，也使得该书图文并茂，可读性甚强。

作为第一读者，我也愿意让更多读者分享一下我阅读该书的体会。除了上述的欣喜，我理解帝都北京的前世，更多是少数民族长期积累形成的政治制度、生活习俗、注重实际的灵活运作能力及其擅长吸收汉民族文化优势，在城市建置及建设上的成就使然。中国的历史城市其实有太多的文化融合，长期以来，学界还是比较清晰地划分少数民族、中原、江南等的建筑与城市或区域的界限，并强调研究成果的独特性，却不曾想，中国首都的血脉中长驻如此深厚的异域色彩。明朝的北京建设受南京影响是个事实，“规制悉如南京，而宏敞过之”（《明史·舆服志》），而明南京是要“治隆唐宋”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国策乃清除异族影响，这可能是汉族的一次反攻倒算，但清朝的北京又再度操作于少数民族满人手中，因此在城市研究中，加强诸如《辽金元时期北京城市研究》这样的深度和广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另一方面，从辽金元时期北京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也会发现从五京制到两都制，再到明朝北京而后陪都的名存实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都城集权化的过程、汉族和少数民族博弈与互动的过程。放大一点看，中国古代城市也并无与西方古代城市存有质本的差异，考古人类学家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用“圣都”和“俗都”的西方城市观念和关系，研究中国青铜时代的都城迁徙和夏商周三代，是有力的证明，而辽代的五京制又何尝不是“圣都”和“俗都”的实际运作呢？这会启发我们打破中西文化平行比较的壁垒，而获得更多人类在建设城市过程中的运作智慧。

从个人而言，我和诸葛净君长期存有饱满的互动，她是我的第一位研究生，看着她 20 年的成长和学术逐渐成熟，我感到欣慰。我和她是师生、也是朋友和家人的关系，我对她宠爱有加也挑剔过度。出于宠爱，她在学问上的求真耿直比较突出，所以在绪言中如果说她的评述有伤长者，也请前辈包涵；因为挑剔，我还希望她加强色目人（阿拉伯人）对于元大都的影响及其在城市空间扩张力方面所起作用的研究，毕竟色目人在元代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当然，这又会是跨越国界的大文章。

诸葛净君让我为该书写序，我早已应允，因为她的博士生导师郭湖生教授已仙逝。但是我工作繁多静不下心来，一直拖延着，直到蛇尾癸巳年即将结束才排除干扰仔细阅读，草就此文，言为序，实为导读。在即将进入甲午马年之际，无论如何也要捷足先登一下。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

目 录

1 绪论	1
1.1 既往研究概述	1
1.1.1 历史地理界	1
1.1.2 考古学界	2
1.1.3 历史学界	2
1.1.4 建筑史学界	2
1.1.5 境外学者的研究	3
1.2 辽金元时期北京城市建设简述	4
1.2.1 辽南京:938—1122年	5
1.2.2 金中都:1153—1234年	6
1.2.3 元大都:1267—1368年	7
1.3 问题、方法、结构	8

上篇 区域角度的解读——京城体系与体系中的京城

2 辽之京城体系	13
2.1 五京的建立	13
2.1.1 营建皇都	14
2.1.2 三京的设置	15
2.1.3 五京备焉	17
2.2 五京体系	20
2.2.1 五京与捺钵地	20
2.2.2 五京体系	24
2.3 辽南京	26
3 大金国的京与都	28
3.1 集权过程中的京、都建置	28
3.1.1 熙宗以前	29
3.1.2 海陵以后	30
3.2 上京与中都的建设	32
3.2.1 金上京	32
3.2.2 金中都	35
3.3 从陪都到首都:中都的政治地位与区位特点	36

4 元代的两都制	41
4.1 两都制与时巡	41
4.2 上都与大都的建设	44
4.2.1 上都	44
4.2.2 大都	46

上篇结语 南京—中都—大都	54
一、政治角色的调整	54
二、经济体系的重组	55
三、城市建设的变化	60

下篇 剖 面——关于城市诸空间体系的解读

5 关于帝制的空间技术——建筑、礼仪与空间秩序	67
5.1 宫室制度	67
5.1.1 金中都宫室及其与前朝宫室制度的关系	67
5.1.2 元大都宫室中的文化双重性	78
5.2 中枢机构	81
5.3 金之太庙问题	83
5.3.1 原庙、神御殿、影堂、影殿	83
5.3.2 金中都之太庙	85
5.4 帝制的空间序列——礼仪角度的观察	88
5.4.1 金中都	88
5.4.2 元大都	95
5.5 小结	97
6 商业、交通与城市生长	99
6.1 买者与卖者	99
6.1.1 赋役人口	99
6.1.2 宫廷与中央政府	100
6.1.3 军、站、匠户	100
6.2 城市市场的分布及其相关问题	101
6.2.1 城中市场分布	101
6.2.2 庙会	106
6.3 商业交通体系与城市的生长	107
6.3.1 市场与交通	107
6.3.2 城市的生长	108
7 都中之寺院宫观	111
7.1 寺观与社会	111
7.1.1 各教派的情形	112

7.1.2 寺观等级	116
7.1.3 国立寺观	118
7.1.4 宗教活动	121
7.1.5 寺观经济	125
7.2 寺院宫观之空间分布	127
7.2.1 辽南京时期	127
7.2.2 金中都时期	128
7.2.3 元大都时期	128
7.3 小结	134
8 居民、街巷体系与城市管理	135
8.1 由史料略可推论的居民分布状况	135
8.2 街巷体系	138
8.2.1 坊、街、巷	138
8.2.2 考古资料中所见之元大都居住形态与大都的街巷肌理	140
8.3 城市管理	142
8.3.1 警巡院	142
8.3.2 坊、巷、社	143
下篇小结	145
一、关于变迁	145
二、关于形态	146
结语	148
附录一 金中都宫室之相关文献记载	150
附录二 元大都宫室之相关文献记载	154
附表一 寺院状况一览表	159
附表二 宫观状况一览表	167
图表目录	171
参考文献	174
后记	179
致谢	180

1 緒論

在华北北部有一片小平原，其西部与北部分别被太行山余脉西山及燕山余脉军都山所包围，东面则面向广阔的海洋，只有东北一线过山海关与东北平原相通，南面渡永定河沿太行山东面山麓可至华北大平原，这片地方习惯上被称为“北京湾”，而侯仁之先生则称之为“北京小平原”（图 1-1）。中国古代历史中，这片平原上先后建立过一系列的地方行政中心与都城，尤其在封建社会的后期，辽、金、元、明、清相继在此建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亦以此为首都。因此对于这座城市的研究始终受到学界的关注，而不同的学科也已经有了丰硕成果。本章首先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择其要者述之，然后概要叙述辽金元时期的北京城市建设，最后提出本书所尝试讨论的问题。

另外，如所周知，城市的名称迭有变动，辽称南京，金为中都，元为大都，明始称北京，但为叙述的方便，文中在涉及较为泛泛的论述时，便皆通称为北京。

1.1 既往研究概述

以下对大陆学者的研究根据学科分而述之，境外的研究成果受条件所限不能一一尽读，大多通过别的学者的转述有所了解，故此境外的研究成果单列一节。

1.1.1 历史地理界

历史地理界对北京城市的研究，以侯仁之先生的研究以及他指导的一批学位论文为代表性成果，其研究范围涉及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各个方面。如李孝聪的《公元九—十二世纪华北平原（黄海亚区）交通和城市地理的研究》，伍旭的《北京城及近郊庙宇分布的历史变迁与庙宇对文化的塑造和影响（辽—清）》，高松凡的《历史上北京城市市场变迁及其区位研究》，韩光辉的《清与民国三百年间北京今市域内人口地理的初步研究》以及唐亦功的《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等，并结集成为《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出版，其中韩光辉的人口研究与尹钧科的郊区研究也都已经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另外，侯仁之先生于 1988 年主编出版了《北京城市历史地图集》（第一集）。

韩光辉先生除了以独特的切入点对城市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构成、数量及变动原因作出了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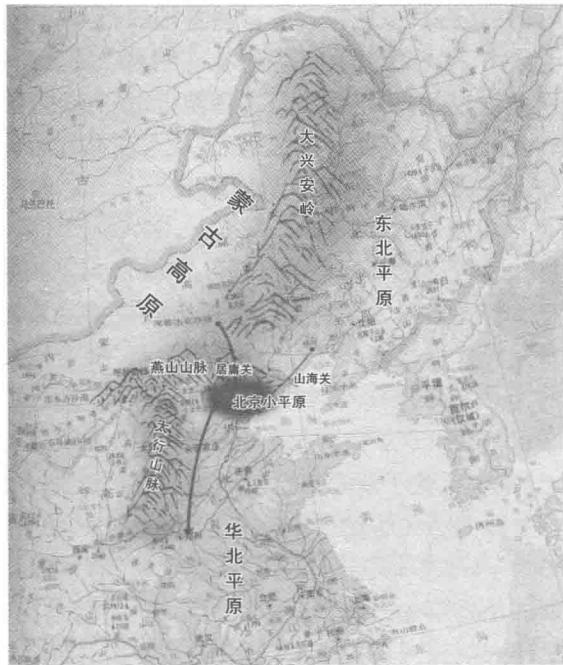


图 1-1 北京地理形势图

底图来源：总参谋部测绘局，2006:13

人信服的推断之外,在关系到城市管理制度的警巡院问题上也进行了深入研究。

侯仁之先生的一系列文章(收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及《侯仁之文集》)对于北京建城的起源,城址选择的原因,水资源在大都新城选址和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特点,设计思想,元大都城及明清北京城的城址变迁,河湖水道及规划特点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有精要见解。

至关重要的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的城市复原成果主要见于《北京城市历史地图集》(第一集)及《金中都》等相关著作中,与复原有关的问题的探讨也散见于各种期刊论文。较重要者如周峰的《辽南京皇城位置考》、岳升阳的《金中都历史地图绘制中的几个问题》等。

由于关系到漕粮运输、城市供水以及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对城市的影响和清代西郊园林的开发,水系的问题始终是北京城市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中,蔡蕃先生的专著《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研究》从水利科技的角度,论述了北京漕运工程及城市供水排水工程的历史发展过程,极有参考的价值。

1.1.2 考古学界

考古发掘之实物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已无需多论。关于北京城市史的最重要的考古发掘报告当属阎文儒先生之“金中都”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的“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此外,1990年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配合北京市西厢工程开展了金中都城垣、宫殿区的考古勘测与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齐心,1994)。2003年出版的《北京辽金史迹图志》集中反映了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的工作者对北京辽代和金代文物进行专项调查的成果。

徐苹芳先生的研究成果亦蔚为大观,相关的文章主要收录于《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的“城市考古”一编中,关于金中都的“四子城说”,《事林广记》所绘中都图的可信度问题以及相关城市规划的论述都令人钦佩。更通过对于御史台、枢密院所在位置的考订,提出了如何在沿用至今,不方便作大规模考古挖掘的城市中,对重要建筑的地理位置进行考察研究的方法。徐苹芳先生亦主持绘制了《元大都城图》[收于侯仁之先生主编之《北京城市历史地图集》(第一集)中]以及《明清北京城图》,都有着极高的可信度。

1.1.3 历史学界

首推陈高华先生对于大都城市的研究,有专著《元大都》一书,对于大都城从城市建设到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都有所研究,其书虽薄,但论述却经典,是研究北京城不能忽略的成果之一。此外还有论文《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等。

于杰、于光度先生在1989年出版了专著《金中都》,书中虽小有可商榷之处,但是对于与金中都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建设与社会问题,以及中都的前身辽南京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为前人的成果也不可忽视。

1.1.4 建筑史学界

国内建筑史学界学者站在城市史的立场详细论述了从辽南京至明清北京城市发展的著作,较重要的有两种:贺业钜先生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和郭湖生先生的《中华古都》。

另外,杨宽先生虽然是历史学家,但其著作《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较为接近城市史的研究,故于此处一起加以比较。

贺业钜先生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一书,将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发展置于社会发展阶段的框架中,以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视角加以分析。按贺先生的分期表,从金中都到明清,北京属于北

宋末至清鸦片战争之间约七百年的后期封建社会的城市规划,即体系传统革新成熟期(后期)。贺先生的著作中最有特色的是以区域规划的宏观眼光,揭示了都城与京畿地区各府州县之间形成的政治、经济网络层次关系,并从总体布局、分区规划、商业网规划与坊巷规划等几个方面对金中都、元大都与明北京这几座城市进行了分析。

但我认为贺业钜先生的著作还有几个不足之处,其一,关注变迁结果所体现出的意义甚于变迁本身及变迁的原因;其二,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变迁看作是向着某种特定的且是越来越先进的目标前进的历史进程;其三,将变迁表达为自上而下的不断改进。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讲以单一的尺度来衡量变动不居的时空变迁,有时并不能透彻揭示变迁的丰富性及其动因。

杨宽和郭湖生二位先生均以都城形制的发展为脉络(这个城市形制包括宫城在大城中的位置、宫城的布局与宫城中轴线的序列、宗庙官署等其他重要官方建筑的分布、大城中居民区与市场的分布等),以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为依据来探讨都城变迁。

杨宽先生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辽五京、金上京、金中都与元、明、清各代都城的建设与布局,包括内城与外郭之间的关系,内城中宫殿的布局,官署、市场、平民居住区、水系、宗庙等,总的来说注重城市各个细节的考证;而郭湖生先生的《中华古都》则在考证的基础上,更着重于都城形制变化的前后关系,认为金中都在从宋汴梁到元大都的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也对城市建设中涉及的工程技术问题给予重视。

2001—2003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五卷本《中国古代建筑史》,在某种程度上这套书可视为中国大陆1990年代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的总结之作。其中的第三卷“宋、辽、金、西夏建筑”与第四卷“元、明建筑”分别对辽南京、金中都与元大都作了论述,并兼及辽上京、辽中京与金上京。

在第三卷“宋、辽、金、西夏建筑”中主要以考古发掘与文献史料为依据对辽代三座都城及金代两座都城的布局做了较细致的描述(郭黛姮,2003)⁵⁹⁻⁷¹,但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来说并未有超越前人之处。

第四卷“元、明建筑”对于元大都的城市建设有较全面的论述(潘谷西,2001)¹⁶⁻²¹,是关于这一时期都城建设研究的较新成果之一。文中考察了元大都的建设过程与城市布局特点,尤其在元大都规划与《考工记》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以贺业钜先生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元大都在中国历代都城中最完整地模仿了《考工记》所规定的都城形制,而潘谷西先生根据当时城市规划设计的实际情形和城市建设的过程,认为“(元大都)非但不是复《考工记》之古的都城典型,相反,倒是一个能充分因地制宜、利用旧城、兼收并蓄、富有创新精神的都城建设范例”。笔者以为,潘谷西先生之说更有说服力。

近年清华大学王贵祥教授主持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合院建筑尺度与古代宅田制度关系以及对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市街坊空间影响研究”,从成果看研究着眼点在于建筑群的基址规模,但对于理解古代城市亦大有启发(王贵祥,等,2008)。在与元大都直接相关的几篇论文中(姜东成,2007b),作者根据对元大都城市规划的研究成果^①,分别对大都城中的重要建筑群孔庙、国子学与敕建寺院大承华普庆寺进行了复原,并对元大都敕建寺院的分布与建筑模式进行了探讨。这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元大都的城市规划特点。

1.1.5 境外学者的研究

徐苏斌所著《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较为全面地介绍了1995年以前日本学者的研究

^① “元大都的城市规划采用44步×50步的平格网,对大都城内街道胡同的间距、大建筑群与住宅的用地范围起到控制作用,在大都城市平格网基础上可以细化作出11步×12.5步的平格网,中小建筑群基址规模受其约束。”转引自姜东成(2007b;注解6)。

(徐苏斌,1999),从中可知,由于历史等各方面原因,日本学者对于中国东北的城市与建筑较为关注,因此对于辽金元时期各都城很早就展开了调查与研究。

西方学者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可参考史明正先生的综述性文章《北京史研究在海外》(史明正,2000),其中有关古代北京的研究以夏南希女士的 *Chinese imperial city planning* (STEINHARDT N S,1990)较为重要,自出版以来已是国外高校相关专题的必读参考书之一。

此书出版于1990年,是夏南希在1981年完成的关于元大都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充而成。该书以当时所能获得的考古资料与研究成果,以及相关的文献记载与古地图为基础,对夏商周以来的中国都城做了较全面的论述。其中六、七两章涉及辽金元时期建造与使用的数座都城,指出其格局与建筑形式所受到的汉文化的影响,并特别指出元大都在形式上采用中原传统的都城格局,但实际生活方式仍然保留了蒙古本民族的习俗并在城市空间中有所表现。该书将都城形制视为历代统治者(汉族或非汉族)用于表明统治的合法性的手段,并注意到古地图中所表现出的理想都城形制及其与《考工记》论述间的关系,这样的思路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仍具启发意义。

1.2 辽金元时期北京城市建设简述

综合前人的成果,可将辽金元时期北京城市建设的几个主要阶段勾勒出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也为后文的展开建立一个基本的时空框架(图1-2)。



图1-2 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城廓位置示意图

底图来源:北京测绘研究院,2008

1.2.1 辽南京：938—1122年

辽南京继承了唐幽州城。据《北京考古四十年》，其城垣东墙似在今烂漫胡同稍偏西一点的地方；北垣，自白云观北之小河向东流，穿东西太平胡同，达头发胡同之北的受水河胡同，似唐幽州城之北护城河（北京文物研究所，1990）¹²⁷⁻¹²⁸。辽南京之东垣与北垣与幽州城相当，南垣大致与右安门城墙相近；西垣大约在会城门村东贯穿白石桥东，向南延长的一线（北京文物研究所，1990）¹⁴¹⁻¹⁴²。但岳升阳在其《金中都历史地图绘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仅认可了北城墙的位置，关于西、南、东三面城墙认为都应重新加以考虑（岳升阳，2005）。有鉴于此，本书之《辽南京城示意图》仅为城市各要素之相对关系的示意。

辽南京外城有八门，东为安东、迎春；南为开阳、丹凤；西为清晋、显西；北为通天、拱辰。^①

连接城门之间有四条大街，其中两条截止于皇城。城北安东—清晋门之间的大街，似即檀州街，此街当在今广安门内外大街上；悯忠寺门前的大街，应为今南横街，当时是辽南京城迎春门内大街；拱辰—开阳门间的大街，相当于今内城西南部的南闹市口、经过牛街直到南樱桃园与白纸坊东西街的交叉处一线；通天门内大街应在今天宁寺东，明清外城西护城河之西（于杰，于光度，1989）¹⁰⁻¹¹。

辽南京城的城市居民管理仍沿用了幽州时的里坊制度。《乘轺录》载：“（幽州城）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贾敬颜，2004）。

幽州在唐时为州级地方城市，按照唐时地方城市形制，其衙署单独建一子城在大城之中，安史之乱及刘仁恭时，将州衙扩建为宫殿，后辽以此城为南京时，继续沿用了这一区域并加以扩建，作为皇城。其位置在外郭城的西南隅，所谓“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皇城的西墙即是外郭城的西墙，皇城的西门即是外郭城的西门（杨宽，1993）⁴³。皇城东北角有燕角楼，应在今南线阁胡同（北京文物研究所，1990）¹⁴²。皇城南墙与外郭城南墙重合，其南门丹凤门即外城南垣西门（周峰，2001）⁶³⁻⁶⁴。

辽代对于南京皇城的建设和改动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圣宗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八月“改南京宫宣教门为元和，外三门为南端，左掖门为万春，右掖门为千秋”（脱脱，等，1974）¹⁶²；另一次是兴宗重熙五年（1036年）下诏修南京宫阙府署，主要宫殿有元和殿等（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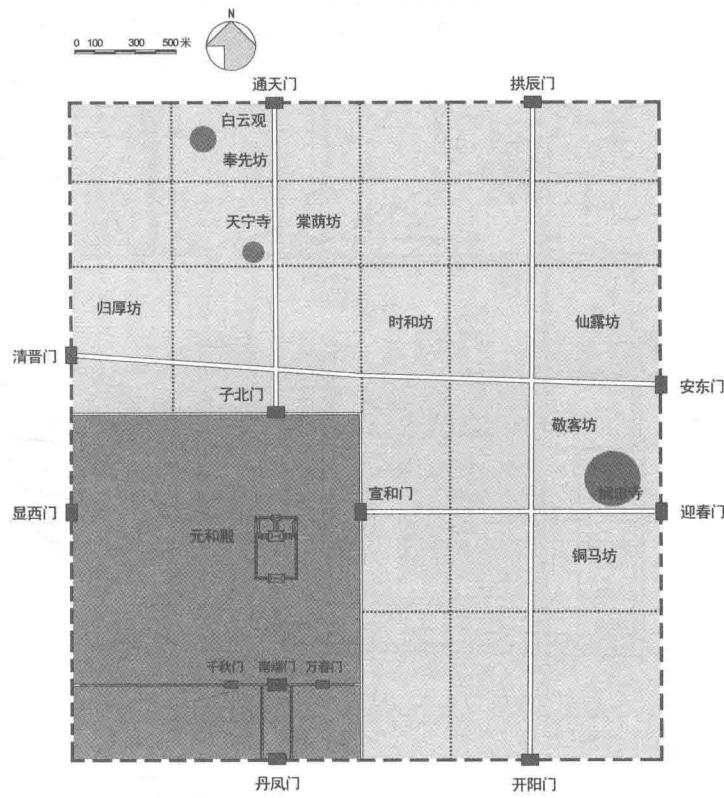


图1-3 辽南京城示意图

^① 另根据周峰考证，东垣之南尚有一暗水门，即路振所言水窗门（周峰，2001）。

今北京城中与辽南京密切相关的重要遗迹为建于辽天庆九年(1119年)的天宁寺塔。今日之法源寺可追溯至始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的唐幽州悯忠寺,后虽经历代重修,但寺址始终未变,因而也是研究辽南京与金中都的重要地标,法源寺中还陈列有重要的辽代文物。

1.2.2 金中都:1153—1234年

金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将金之都城由上京迁往燕京,改名中都,并在原辽南京城的基础加以扩建。金之中都城建设,尤其是宫室制度,多仿北宋汴京。张棣《金虏图经》言:“亮欲都燕,先遣画工写京师宫室制度,至于阔狭修短,曲尽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①经此改造,皇城的位置由原来的偏居西南隅变成了近似位于城中。

中都的范围,根据考古调查,西城墙北端在羊坊店东南角,南端在凤凰嘴村西南角,全长近4530米;南城墙,从凤凰嘴西南角东转,东到万泉寺、菜户营等,全长近4750米;东城墙在黑窑厂、梁家园一线以西,全长近4510米;北城墙大约在会城门、羊坊店一线,全长应为4900米。内城范围东墙在今南线阁街稍东的南北直线上;西墙在白云观铁道西大土堆南至小红庙村的南北直线上;

南墙在鸭子桥以南东西的直线上,北墙在白菜仔村北东西的延长线上,其东隅为老君地(阎文儒,1959)。大致相当于今天北京的北至椿树馆小学、南至菜户营稍南、东至南线阁街稍东、西至广安门车站西街的范围,其中宫城的南墙(即应天门)在鸭子桥南里一线。这些地名以及凤凰嘴以北以东残存的土墙痕迹在民国三十六年的《北平市城郊地图》中也还清晰可辨(王瑞平,王俊芳,2006)。

而北起广安门外大街、南至鸭子桥南里,沿广安门南滨河路南北一线分布着一系列夯土基址,其中大安殿、大安门及应天门的位置已经确认,因此,这一线为金中都宫城的中轴线(齐心,1994;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4)。

中都外城十二门,门门相对共有六条大街,其中施仁一彰义门之间的大道,在唐辽檀州街的基础上延伸而成,即今广安门内外大街一线;而崇智一景风门之间的大道是辽南京拱辰一开阳门之间大道延伸而成,因此也能从今天的牛街看出其走向(于杰,于光度,1989)²⁷。颢华门与宣曜门以及丽泽门与阳春门亦两两相对,中有大路连接(岳升阳,2005)。城内仍保持了坊这种居民管理方式,共有六十二坊,坊有坊正,但是作为地域的坊是否有坊门、坊墙,文献中没有明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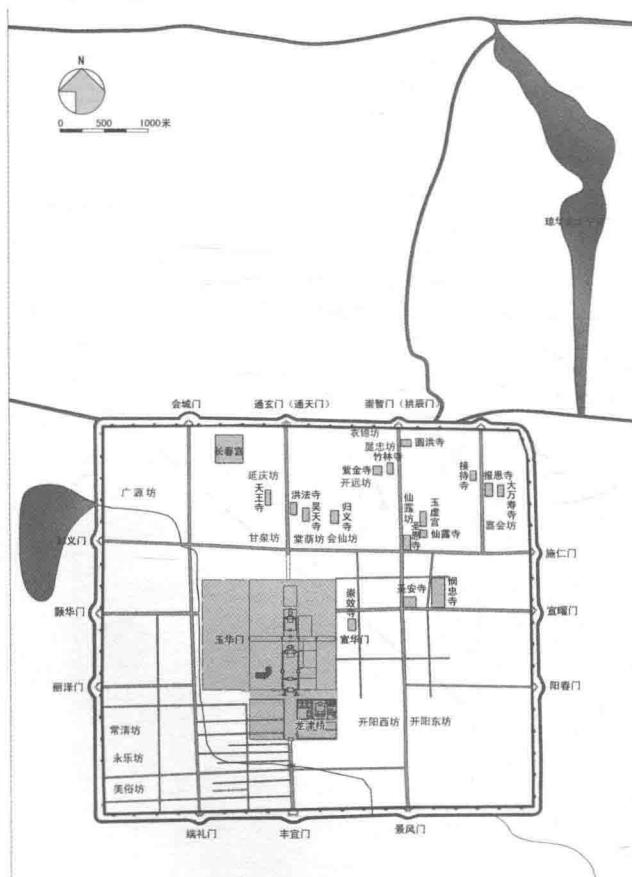


图 1-4 金中都示意图

底图来源:金中都(大定、贞祐年间)图(侯仁之,1988)²⁴

丽泽门与阳春门位置参照岳升阳的看法作了调整。宫城复原详见本书第二章。

^① 张棣. 金虏图经(宋文懋昭,1986)

的记载。城北的大悲阁附近是中都最重要的市场区(图 1-4)。

中都城的河流供水系统有三个,一是从古代洗马沟水(金称西湖,今莲花池)发源东流围绕辽宁南京旧城西部及南部的河,此河东流经鱼藻池南,经宫城应天门南,于悯忠寺南,今姚家井迤北向北流,经今烂漫胡同北流,原为辽南京西南东三面城濠。中都扩建之后,成为中都之内河。此旧城濠在今时尚未完全干涸。金中都东水关已经过考古发掘,位于北京市区西南部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今辽金城垣博物馆中。

二是从钓鱼台(今玉渊潭)蓄水池向东南流至会城门,进入北护城河,又经长春宫北之水门进入城内,流经中都城北部,向东从施仁门北水关流出城外。

三是从中都城正北方高良河(今高粱河)南引,经南北向之大水渠(今南北沟沿)导入中都城的北护城河(于杰,于光度,1989)。

1.2.3 元大都：1267—1368年

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在原金中都旧城的东北建造一座新的都城,即元大都(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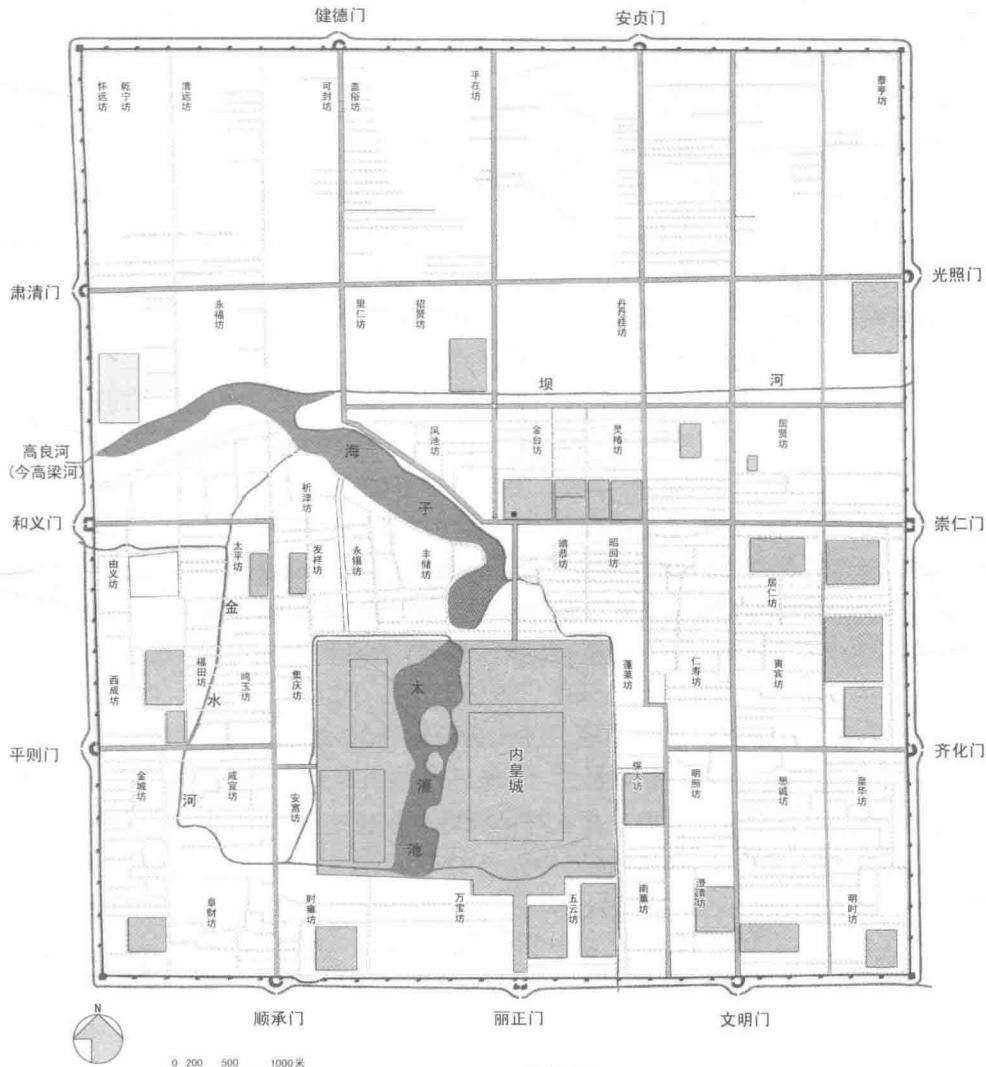


图 1-5 元大都图

²⁸ 底图来源：元大都（至正年间）图（侯仁之，1988）。